“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

厘清“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的差异与统一是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 杨 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

的确，《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对人类发展的前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海尔布隆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当代必要的‘哲学’，它不仅提供了历史观，同时，它也是作为创造历史的行动的指南”。可见，海尔布隆纳是把马克思主义上升到“行动指南”的层面加以阐释。

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行动指南，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的真谛所在，也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因为此，与时俱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尽管诞生于19世纪，但并没有止步于19世纪；尽管产生于欧洲，却影响了全世界。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把握时代脉搏，坚持问题导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焕发出蓬勃生命力，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指出，尽管世态多变，但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的著作仍然不失其效用。他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并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深入披露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独有的、最不朽的成就。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些过时论常常以时过境迁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消除或缓和论、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熄灭论、与实践不相符论等多种形式登场。深入探究，这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错误思想根源就在于只看到了“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的差异性，却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统一性。

“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的差异性主要由于两者所处的时代条件与历史语境不同，各自面对的现实性问题与历史任务也不同的。“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一脉相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中立场是基石，观点是核心，方法是灵魂。

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也在实现自我革命，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旧有的在场形态进行自我扬弃。“在场”意味着追求统一，而“出场”则意味着差异的呈现。如果要想真正理解在场的统一，那么就必须深刻理解出场带来的差异。统一与差异，相互区别、相互照应。如果把一切在某种特定语境中形成的理论结论、话语僵化为永恒在场的逻辑，就是教条主义。这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产生的主要根源。

因此，我们在看到“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之间差异性的同时，还要看到他们之间的统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经为工人阶级的胜利与人类的解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西方世界又重新“热捧”马克思的“幽灵”。

正确处理“当年马克思”与“当代马克思”之间差异与统一的辩证关系，需要树立科学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既然是行动指南，那就意味着为人们提供的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启迪，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因为任何真理一旦剥去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与语境，就不再为真理了。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当下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积极回应群众的社会关切。

重读经典

居官历练后正好读书

从政实践与理论学习是相辅相成的，为官者要在实践之中印证所学的知识，在学习与实践的互动中深化对于经典的理解、提升自己的从政水平。

□ 孙劲松

《图民录》是清代政治家袁守定所著的官箴类书籍。该书指出：“居官历练后正好读书，更觉亲切有味，所以然者，由古昔圣贤直从历练后，见得事之真确，故吐辞为经也。《大学》言平治天下原本于致知、格物，重闻道也。人学则闻道，而义理用事，所措必当，所至必治；不学则不闻道，而私意用事，所措必不当，所至必不治。”官员经过从政实践的历练以后，正好读书，更觉得经典非常亲切。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经典著作都是古代圣贤在实践中反复历练后，将切实可行的原则与经验记录为典籍。《大学》指出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要依靠“格物、致知”所学习的“道理”，一个从政者如果依照其学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去制定、实施管理方略，那么必然会举措得当、治理有方，反之必然会出乱子。该书还说：“古人道味深故好学，愈好学而政事愈明。若道味不深。一登仕版，便废学问，既无义理以浇灌其心，惟日讲求于刀笔筐箧之间。曰：仕途中别有道也！充其所能，只一老吏。乌足以臻上理乎？”对于古代经典记载的修身治国之道体会得越深，其治国理政就愈清明。若体道不深，学业不精，一当官就放弃了学问与品德修养，每天陷于一些具体的文牍事务，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刀笔吏而已，不能成为有德行、有成就的政治家。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古代士大夫读书范围很广，可以说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宗教人文无所不包，在这里我们仅列举一些与其从政紧密相关的内容加以介绍。

读儒典。儒家学说以修身为本，而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其核心经典大都是古人在修身齐家、治国理政实践中体悟出的原理，也记载了许多具体的案例。恰如《图民录》所言，“由古昔圣贤直从历练后，见得事之真确，故吐辞为经也。”西汉的汉宣帝就亲自召集儒臣探究“五经”异同，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在学者讨论的基础上由皇帝亲自裁决，宣帝以后，“五经”的地位日益重要，为治天下者准则。唐太宗登基之后，也崇尚儒学，设置弘文馆，命令颜师古考订《五经》，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宋初的宰相赵普则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宋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新即位，应当学习儒学，就请孙奭、冯元进为皇帝讲《论语》。起初是隔一天讲一次，后来是每天都要学习。皇帝在经筵讲读时，如果因为疲倦而左顾右盼、伸腿扭腰，孙奭即端拱而立，停住不讲。宋仁宗见老师如此严肃，即时收拾精神认真听讲。

读史书。唐太宗就非常喜欢读历史，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曾说：“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指出其在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贤臣辅助国家，忠臣以死效命，不由得掩卷叹息而神交古人。清代官员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指出：“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申。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儒家经典所论述的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大原则，而史书则是记录历代成败得失的具体事例。当官以后，在工作之余，要把读历史、参究古人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当作一个重要内容，但也不能拘泥于古代的案例，要根据现实情况活学活用。清代学者徐栋原所编的《牧令书辑要》还提出官员要注重阅读地方志，“苟有余暇，即宜读书，先看省志，庶几全局在胸，事有把握，勿以纸上空谈忽之”。到一个地方、一个行业当官，应该先读有关的地方志、行业志，才会理清脉络、胸有全局，处理政务也就有了把握。

读律例。《图民录》引用明代政治家薛瑄的观点指出：“吏道以法令为师”，应该熟读“律例”，律例就包括法律及相关条例。“若平日于律例未尝习熟，一旦置之堂皇之上，不特大案当前，不能觑定归结之处，以求其所至要；即户婚田土诸细故，皆不能有所遵循、明于处置，其谬也多矣。”如果平常不反复阅读法律以及各种条例，在工作之中不能依法行政、依律断案，就容易出问题。

看邸抄。“邸抄”又称“邸报”“朝报”“条报”“杂报”，唐、宋、元、明、清诸代，邸抄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是朝廷传知朝政和臣僚知晓朝廷动态、政情的媒介，相当于现在的报纸或者内参。《图民录》指出：“看邸抄有益。不但条议新例、刑名成案概具抄中，可以遵法。凡督抚列款参官虽细不宥，知稍涉此便干罪谴，大是可畏，岂非身心之一助乎！语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邸抄事之已成者也。”邸抄包罗的内容很广，各种新旧制度条例、各地重要的刑事案例都在其中，可以遵照与参照执行，而且督抚参劾贪官的文稿也在里面，阅读这些可以警醒自己廉洁奉公，对身心是一大帮助。《韩诗外传》曾说，如果不知道怎么当官吏，那就从学习现成的案例入手。邸抄中记载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案例，所以当官的人看邸抄是非常有益的。

干部国学苑

好书推荐

“领导干部学习焦裕禄精神”系列丛书



《怀念焦裕禄》 《纪实焦裕禄》
《讴歌焦裕禄》 《学习焦裕禄》
作者：吉炳伟 主编
出版：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8月

内容简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焦裕禄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指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党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这套丛书梳理了与焦裕禄相关的文献档案资料，真实再现了焦裕禄的人生轨迹，多角度、全方位地为大家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真实完整的焦裕禄事迹，并首次呈现了5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倡学习焦裕禄精神、新闻媒体宣传焦裕禄精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焦裕禄精神的历程。书中力求以今天的视角，用新的时代眼光深度挖掘焦裕禄精神的丰富内涵，告诉人们一个更完整、更丰厚、更深邃的焦裕禄，展现一个伟大的灵魂所蕴藏的精神财富。本套丛书内容全面、体裁多样、图文并茂，为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焦裕禄精神、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供了新的范本，是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权威参考读物。

序与跋

新经济助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式跨越：新经济引领新常态》序

□ 赵长茂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并强调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推动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积极作用”。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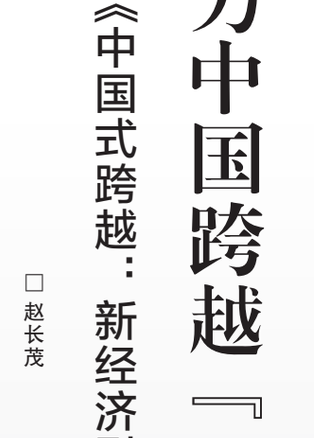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12月发表的文章中，是指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实施信息技术革命、放松管制和全球化策略，在保持低通胀率和低失业率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李克强总理重提“新经济”，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准确把握，是对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深刻把握。以往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出口，属于粗放式发展。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消耗了大量能源和资源，许多地方环境被污染，生态遭破坏，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必须改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把“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单独成篇。“互联网+”、大数据、网络经济、分享经济等都是新经济的典型代表，可见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新经济的重视程度。

刘云山校长在中共中央党校2015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增强驾驭现代经济发展、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素养和能力。如果总是沿用老的思路和办法，就难以胜任现在的工作。领导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意识，加强学习调研，加强实践历练，努力掌握现代经济知识，努力具备较强的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力争有“几把刷子”。

发展新经济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中国式跨越：新经济引领新常态》一书的作者长期从事经济和信息化研究，承担了多个与新经济相关的政策研究课题，走访过许多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出了不少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该书中有多方面体现。《中国式跨越：新经济引领新常态》一书紧扣国家有关政策，用数据说话，用案例说话，摆事实，讲道理，值得广大领导干部参阅。



用典释义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

【讲话原文】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出处】

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东汉）王充《论衡·超奇第三十九》

【解读】

《论衡·超奇篇》谈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超等奇才。王充认为，学习积累与博通的目的，在于学以致用；否则，积累再多，博通再好，这样的学习也是毫无价值的。王充继承了儒家通经致用传统，把儒分为四等：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他认为：“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

关于通人，王充定义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并指出：“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生”疑为衍文）书主人。”通人见识广博，如果不能用所学来论证事理，那也只不过是一位藏书人罢了。因而提出了“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意思是，人们之所以重视通人，就是看重他们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王充指出，如果止于知而不能用，即使读诗读经千篇以上，也只是鹦鹉学舌而已。

王充“学贵有用”的思想来自孔子，文中他引用孔子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意思说能够背诵《诗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干不了的人，跟那些见过草木却不会采伐的人，是一路货色。王充反对儒者习经死记硬背，主张研习经书要灵活运用，反映出汉代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汉崇经术，实能见之施行”。唯其如此，经学才能在创新中获得发展，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对社会产生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如何“用”？他进而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

（杨立新）